



博雅人文读本

美国革命读本

American Revolution Reader

盛 嘉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博雅人文读本

美国革命读本

American Revolution Reader

盛 嘉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革命读本/盛嘉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8

(博雅人文读本)

ISBN 978-7-301-27401-9

I. ①美… II. ①盛… III. ①美国独立战争—研究 IV. ①K712.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88328号

- | | |
|-------|--|
| 书 名 | 美国革命读本
MEIGUO GEMING DUBEN |
| 著作责任者 | 盛 嘉 主编 |
| 责任编辑 | 陈 甜 李学宜 |
| 标准书号 | ISBN 978-7-301-27401-9 |
| 出版发行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 地 址 |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
| 网 址 |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
| 电子信箱 | pkuszs@126.com |
| 电 话 |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5 |
| 印刷者 | 三河市博文印刷有限公司 |
| 经 销 者 | 新华书店 |
| | 965 毫米 × 1300 毫米 16 开本 26.5 印张 448 千字 |
| |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
| 定 价 | 62.00 元 |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 电话: 010-62756370

目 录

导言:重新认识美国革命的历史 盛 嘉/1

美国革命历史叙事的建构

意识形态与美国革命的历史叙事 李剑鸣/21

美国革命时代的成年经历 迈克尔·朱克曼/67

谁造就了华盛顿的不朽英名? 张 光/80

走出中国美国革命历史叙述的困境 盛 嘉/95

革命的起源与反抗

作为帝国的英国 彼得·马歇尔/107

英国议会对北美殖民地控制的
 强化及其意义 埃德蒙·摩根, 海伦·摩根/117

美国革命的先决条件 杰克·格林/127

民众政治的出现 理查德·毕曼/139

商人革命者的复杂动机 托马斯·道尔弗林格/152

联合抵制促进了美国革命的激进化 蒂莫西·毕林/160

北美民兵的优势与劣势 唐·希金博特姆/173

宣布独立 波林·梅尔/184

革命中的民众

革命与女性的权利	琳达·科博/195
黑人与美国革命	伊拉·柏林/206
内战、革命和党派之争视角下的效忠派	罗伯特·卡尔霍恩/218
注定失败的印第安人	格里高利·唐德/226

宗教与美国革命

宗教在美国革命中的作用	威廉·麦克洛克林/241
存在一个革命的千禧年吗?	乔恩·巴特勒/247

革命的意识形态与启蒙

美国革命中激进主义的转变	伯纳德·贝林/259
作为一场启蒙运动的美国革命	戈登·伍德/273

宪政革命

推动宪法制定的观念与利益	杰克·雷克夫/287
制宪会议上发生了什么?	兰斯·拜宁/297
宪法辩论的主题	伊萨克·克莱曼尼克/307
权利法案的政治	伦纳德·莱维/318

美国革命的激进与保守

美国革命维持了社会不平等	芭芭拉·史密斯/331
革命摧毁了君主制,为民主铺平了道路	戈登·伍德/336
美国革命推进了男性和女性权利的发展	罗斯玛丽·扎格里/343
改变美国北部人文形态的革命	爱德华·康特里曼/355

美国革命的激进与保守	阿尔弗雷德·扬/365
附 录	
美国革命大事年表	盛嘉 廖平 编译/385
延伸阅读	/389
后 记	/417

导言：重新认识美国革命的历史

革命在世界近代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往往标志着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开端,一种新的政治文化的最初形态。作为一种持久的历史力量,革命往往还以各种方式规范和制约后来许多事务的势态和社会变化的走向。美国革命(The American Revolution, 1763—1791)是美国历史上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不论是在 18 世纪的历史语境中,还是在当下,这场革命的原创性和所取得的业绩都令人惊叹。首先,这场革命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一场独立战争的格局。它既是一场旨在争取独立的战争,又是一场争取自由的政治革命,还是一场深刻改变北美社会性质和结构的社会革命。与此同时,它也是一场具有特殊意义和特征的启蒙运动。其次,在这场革命中,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大规模的民主共和政体的国家得以创建;分散在北美各殖民地的不同文化、不同族裔和不同宗教背景的多元群体得以逐渐凝聚为一个新的民族。美国革命还为美国政治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为美国文明价值体系的建立创造了条件。从全球视野来看,美国革命还是 18 世纪世界历史上的一场重大国际事件,是世界历史的一个转折点。这场革命不仅改变了当时世界的格局,而且还影响了以后世界历史的进程。

然而,长期以来,中国历史学界对美国革命的历史叙事却有不少误读之处。比如,只是简单地将其视为一场独立战争,或者笼统武断地贴上“资产阶级革命”的标签,忽视革命中一些重要的议题等等。因此,我们编辑出版这个《读本》,希望能够为中国读者更好地认识美国革命的历史提供一个有价值的参考。

一般说来,要认识一场革命的历史主要有三种途径:一是历史的方法,二是比较的方法,三是批评的方法。在对美国革命历史的认识上,所谓历史的方法,就是沿着美国革命本身的历史脉络来认识这场革命,在解读可信历史文献史料的基础上,以革命当时所处的历史语境为考量,关注革命本身所面临的具体问题和困境。而比较的方法则是将美国革命与世界近代史上的其他革命进行比较研究,这是认识和鉴别革命的性质和特征的一种方法。批评的方法则是对美

国革命的不同历史叙事进行解构和批评分析。为了能够沿着美国革命本身的历史脉络来认识这场革命,本书主要采用历史的方法来选编文章。又因为美国革命的历史研究一直是美国历史学领域中的显学,几乎每一代历史学者都以自己的方式和风格丰富了美国革命的历史叙事。因此,《读本》从近二三十年来美国史学界发表的关于美国革命的一些历史叙事文本中选编了29篇文章,分为七个主题。它们是:(1)美国革命历史叙事的建构;(2)革命的起源与反抗;(3)革命中的民众;(4)宗教与美国革命;(5)革命的意识形态与启蒙;(6)宪政革命;以及(7)美国革命的激进与保守。

根据历史学的性质和原则,革命的历史叙事与革命本身的历史过程是有区别的。革命的历史一般在关于革命的历史叙事中得以再现。要重新认识美国革命的历史,首先就要认识和把握美国革命历史叙事中所建构的历史过程和内容。《读本》中,李剑鸣的文章《意识形态与美国革命的历史叙事》可以帮助读者了解美国对于美国革命历史叙事的建构过程及其深层原因。这篇文章讨论了两百多年以来,美国革命历史写作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相关性,涉及内容丰富,分析详尽,脉络清晰。特别是对近年来美国史学界关于美国革命历史叙事的介绍和分析,尤其值得关注。迈克尔·朱克曼(Michael Zucherman)在他的文章《美国革命时代的成年经历》中,围绕美国革命中曾流行的一种“成长的比喻”来考察美国革命历史叙事的一个重要心理特征和叙事建构的特征。也就是说,这种比喻不仅反映了革命时期的一种较为流行的心态,也影响着从美国革命走过来的那一代人,不断地借助这一比喻来建构革命的叙事。与上述两篇文章不同,张光的文章《谁造就了华盛顿的不朽英名?》则讨论了对于美国革命中的一位核心领导人——华盛顿的神话建构过程。文章关注的是意识形态与革命历史叙事的相关性,论述了从“成长的比喻”到华盛顿神话建构的过程。通过这篇文章,读者可以了解到美国革命历史叙事在建构过程中的多元性和局限性。在中国的学术语境中,重新认识美国革命历史的一个关键步骤就是解构过去对“他者革命”的误读。盛嘉的文章《走出中国美国革命历史叙述的困境》讨论了政治文化对认识他者革命历史的影响和制约。走出这一困境的途径在于,对历史学原则的敬重、对他者历史的审慎,以及对自我政治文化的反思。

美国革命的历史叙事与18世纪英帝国的政治历史背景是分不开的。最初,革命似乎只是一场英帝国内部的抗税冲突,后来转变成了一场政治与社会革命,并超越了历史地理边界,演变成了一场国际性的历史大事件。这与当时北美殖民地在英帝国的地位和权重,以及英帝国当时的内部结构和外部环境有着

密切关系。彼得·马歇尔(Peter James Marshall)的《作为帝国的英国》一文可以帮助读者从军事、宗教、认同、情感和地缘政治等多重视角了解当时这个野心勃勃的帝国在膨胀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和挑战。美国革命爆发的一些结构性原因可以在英帝国所面临的这些困境和挑战中找到。摩根夫妇(Edmund Sears Morgan and Helen M. Morgan)的文章《英国议会对北美殖民地控制的强化及其意义》则从英帝国政府的内部结构和运作程序来讨论北美各项税法的制定及其遭遇失败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说,是英国政府造就了美国革命。然而,仅仅根据政府管理的内部结构及其所出台的政策,还不能完全解释北美殖民地与英国冲突的各种复杂原因。

当然,外部条件的变化往往不足以引起一场革命。杰克·格林(Jack Philip Greene)的《美国革命的先决条件》一文从殖民地内部的变化来讨论革命的起源。英国与殖民地民众曾经并肩奋战了七年,在1763年赢得战争的胜利。可仅仅十几年的光景,原来的共同体,至少“想象的共同体”内部就出现了分裂。殖民地与英国爆发了多重冲突。格林认为,这其中的一些原因要从殖民地内部的社会与政治变化中寻找。他列举革命前发生在北美殖民地的五项变化,尤其值得注意。这五项变化既构成了革命的先决条件,也是革命爆发的原因。它们是:(1)一批坚定、有凝聚力、高效务实、得到承认的本地政治和社会精英的出现。(2)各种民间的或半官方的社会中心和机构得以建立。(3)高度弹性化和形式多样的政治体系的建立,逐渐形成一种自治的社会机制。(4)各类社会经济、文化和宗教机构的兴起。(5)财富的增长、商业文化的形成和商业经济规模的扩大。

社会精英或许可以进行革命的鼓动,但往往无法成就一场全面的社会革命。任何革命的动员和展开都必须落实到社会民众的层面上。比较而言,美国革命作为一场成功的革命的标志之一,就是这场革命有不同社会阶层民众的多重参与。而民众政治的出现则是这一变化的基础和重要标志。理查德·毕曼(Richard R. Beeman)的文章《民众政治的出现》从革命前的政治语言修辞与社会实际情形,以及政治领袖与民众之间的互动等多个视角讨论当时殖民地民众政治文化的形成和特征。18世纪后半叶的北美殖民地是一个地处世界政治版图边缘的宗教社会,但民众政治意识被唤醒了,政治变成了“对各种利益集团公开的、积极的保护、宣传和动员”的一个资源。值得注意的是,在民众政治出现的过程中,各个殖民地政治文化一开始就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换言之,讨论殖民地民众政治文化,必须要关注不同殖民地的政治文化特征。其实,这也是

美国革命的历史叙事中颇具挑战性的部分。

最初,北美殖民地与英国的冲突集中表现在殖民地民众对英国一系列税法的抵抗,这是武装冲突爆发之前最为激进的行为。托马斯·道尔弗林格(Thomas Main Doerflinger)的文章《商人革命者的复杂动机》则考察了一个特定的群体,即商人革命者参与美国革命的复杂动机。根据他的观察,殖民地商人对革命所持的态度是谨慎和温和的。尽管他们当中有许多人都不满于英国的殖民地政策,但他们并没有在革命中担任重要的领导。像波士顿的约翰·汉考克(John Hancock)那样激进的商人并不多见。在宾夕法尼亚,革命的政治领袖“一般是由一些富有的律师、神职人员和拥有土地的绅士担任,而不是商人”。经济上的利己主义、个人与商业方面与英国的联系、地方性政治的多变性,加上宗教的取向等,这些都是影响商人对待革命态度的因素。尽管商人对革命大多采取了谨慎和温和的态度,但他们还是以各种方式参与了对英国各项政策的抵抗运动。进一步讲,当时各种政治势力常借助民众对英国当局的愤恨,获得更多的地方政治权力和势力范围。所有的反抗都被政治化了,商人作为一个社会群体,自然也不例外。

美国革命中的民族认同感,最初主要源自于外部的威胁,而非单纯的内部凝聚力。一场对抗英国税收政策的联合抵抗行动竟演变成了一场政治意义上的革命,这是美国革命的不可预测性。在参与当时抵抗运动的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不仅不愿意与英帝国决裂,而且也没有想到这一抵抗运动竟会变成一场彻底改变他们命运的革命。蒂莫西·毕林(Timothy Hall Breen)的文章《联合抵制促进了美国革命的激进化》一文为人们了解这一转变提供了一些线索。在当时的多种反抗势力和模式中,他着重分析了当时北美商业文化在最初的抗税过程中所产生的影响。他认为,北美殖民地流行的商业文化是一个促进抵抗运动向激进的革命转变的重要因素,甚至是造成英国与殖民地“文化误解的深刻渊源”。根据他的观察,当时北美大众意识的一些重要变化往往是围绕他们的商业经验而产生的。他认为,“消费市场中的民众政治动员彻底地改变了人们对共同体的认知,以致到1770年代,民众的实践将它们引向了一个独立的、强大的商业帝国的想象”。在一定程度上,这种想象强化了殖民地民众追求自由的动机,也界定了革命的最初目的。这或许是美国革命与其他革命的一个重要区别。纵观世界近代史上的其他几场革命,还没有哪一场革命像美国革命这样,其动员和反抗最初是以消费者为中心而组织起来的。革命最初的许多政治主张和诉求往往是在商业的公共语境中提出来的。具体地说,在激烈的抗税和抵制英国货

的运动中,商业和市场行为与大众的政治紧密地结合了起来。这既是美国革命的特征之一,也是革命那一代人的现代性的一种表现。

独立战争为美国的立国奠定了关键性的基础,开启了革命后续发展的多种可能性。唐·希金博特姆(Don Higginbotham)的文章《北美民兵的优势与劣势》为读者观察这场战争提供了一个内在的视角。如果不考虑国际上的外援因素,美国革命战争是近代世界战争史上一个以弱胜强的典例。北美爱国者所对抗的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这一弱勢的武装力量曾几度崩溃,但最后还是坚持了下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要从这支军队的内部去寻找。华盛顿所领导的大陆军的内部结构和官兵的心理动机,是这支军队能够经历艰难险阻、最终取得胜利的关键。同时,还必须认识到,大陆军并不是一个单纯军事意义上的组织,它是将十三个分散的殖民地维系在一起的特殊的社会与政治组织,是北美民众争取独立的统一符号和民族情感的载体。只要这支军队没有溃散,革命的希望就不会泯灭。除了大陆军之外,各地民兵的作用也不容忽视。毕竟在美国革命中,对英军的第一枪是由他们打响的。他们除了与英军作战之外,有时还与印第安人和效忠派的军队作战。

这场革命战争是英帝国内部的一场全面的、格局复杂的武装冲突,同时,由于外国势力不同程度的参与,这场内战又演绎成一场18世纪的国际战争。几乎当时欧洲的主要强国都参与其中。这场战争不仅改变了北美的政治版图,也改变了当时世界的政治格局,甚至间接影响了远在东方的中国之后的命运。试想一下,当时若不是英国国会决定放弃北美的战争,英、法海军这两个宿敌就免不了要在大西洋的北美海域有一场恶战。若英国海军被法国海军重创,就可能导致英国国力的式微,那么40多年后,英国就不见得会派出一只耀武扬威的舰队与中国进行那场彻底改变古老中国命运的鸦片战争。

1776年7月4日《独立宣言》的发表是美国革命的重要转折点,也是美国革命的一个高潮。波林·梅尔(Pauline Alice Maier)的《宣布独立》一文从一个内部的视角来考察《独立宣言》发表前的社会政治背景。它使读者可以从殖民地内部、殖民地与英国之间的关系来了解《独立宣言》产生和发表所要克服的心理障碍和政治阻力。梅尔特别介绍了《独立宣言》发表前的一系列历史事件,使读者得以了解这一文献产生的实际过程。同时还应注意到,作为美国革命的一部重要政治经典,《独立宣言》的公布标志着美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和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登上了世界历史的舞台。这也是当年约翰·亚当斯一直坚持尽早发表《独立宣言》的考虑。正是借助于《独立宣言》,美国“在国际上有了平等的一

席之地”。而这一步是获取其他欧洲国家,如法国和荷兰支持美国革命的关键。《独立宣言》的世界性意义还体现在它对以后世界其他地方社会转型和革命实践所产生的影响。它甚至对亚洲后来的一些革命者,如中国的毛泽东、越南的胡志明都产生过影响。以跨国(transnational)的视域在世界语境中重新审视《独立宣言》的历史与政治意义,实际上开启了一个美国革命历史叙事的新方向。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美国革命的历史叙事大多围绕着所谓的“种子居民”,即白人中的男性而展开,呈现出一种明显的精英和种族的偏向。而革命民众中的其他群体,如妇女、黑人和印第安人的生存状态,以及她(他)们对革命的贡献(不论是正面还是负面),常常不是被忽略,就是被空泛、笼统、抽象地提及。1960年代以来,受美国多元文化的影响,美国革命的历史叙事逐渐形成了一个“从下向上审视”的倾向。愈来愈多的历史学者开始关注革命中的普通民众和边缘群体。他(她)们的研究丰富了美国革命历史叙事的维度、张力和可信度。“人民”在美国革命的历史叙事中不再是一个可以滥用的概念,也不再局限于白人男性精英的狭小范围。只有在更为具体和细致的层面上讨论“人民”,这种革命叙事才具有意义,这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但这还不够,即使是在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之中,也还有更为细微且重要的区分。例如,妇女作为一个群体,从社会经济地位上,有上层、中层和下层之分;在革命立场和态度上,有爱国者、效忠派和中立派之分;在种族上,有白人妇女、黑人妇女、印第安人妇女和混血妇女之分;在地域上,有北方妇女、南方妇女和中部妇女之分;此外还有宗教信仰和教育程度之分等。

为了使读者了解妇女在美国革命中的状态以及革命带给她们的命运的变化,本书收录了女性历史学者琳达·科博(Linda K. Kerber)的《革命与女性的权利》一文。科博从美国革命对家庭的冲击,特别是夫妻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变化来考察革命对妇女的影响。她指出,在早期与英国的抗税斗争中,妇女不得不与政治发生了联系。前所未遇的社会与政治变化使殖民地的妇女有机会设计自己参与公共活动的方式。不仅如此,妇女参与革命战争的程度要比人们所了解的大得多,尽管当时的爱国者对是否允许妇女正式随军犹豫不决。在革命后期,社会对共和国女性公民角色的提倡也为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营造了氛围。美国革命时期,在妇女自我意识觉醒的同时,男性对女性的期许和态度也发生了转变。这些变化不仅改变了革命后妇女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也改变了美国社会的性别关系。这或许是美国革命激进性的一个具体表现。美国革命中妇女的社会与政治存在还表现在后来宪法中与妇女命运相关的政治概

念的含义,及其相关文本的语言特征之中。从制宪的那一代人,特别是其中的几位核心人物,如詹姆斯·威尔逊(James Wilson)和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对待妇女的态度可以看出,当他们建构新的、共和性质的“想象的共同体”时,并没有将妇女完全地排除在外。由于他们在制定宪法时,常常是在一个“更广阔的层面思考国家”,因而妇女的一些权利已经包含在宪法的条款和意义中。当后人指责革命的那一代人没有给妇女选举权时,不应忽视这一历史过程。

在废除奴隶制和给予黑人奴隶以平等与自由上,美国革命常常遭受批评。但实际上,若将黑人的状况置于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人们就可发现这场革命在许多方面改变了当时美国黑人的命运。伊拉·柏林(Ira Berlin)的文章《黑人与美国革命》论述了美国革命在三个具体的层面上改变了当时黑人的生存状态:(1)北方的一些殖民地通过颁布法令,基本上废除了奴隶制。在南方的一些地方,不论是由于逃跑,还是奴隶主的仁慈,有相当数量的黑人奴隶获得了自由。(2)美国革命爆发时,北美殖民地已有相当数量生长于本土的黑人。他们不同于刚刚被贩运来的黑人奴隶,这些在美国生长的奴隶的自由思想意识在革命浪潮的冲击下有了明显的增强。(3)革命期间,白人对待黑人的态度出现了分化。若从长时段的历史来看,美国革命为后来的南北战争埋下了伏笔。南北战争甚至可以视为美国革命的延续。至少在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的思想深处可以看到这一痕迹。这也是为什么在领导解放黑人奴隶制的斗争中,林肯不断从美国革命历史中汲取道德勇气和精神力量的深层原因之一。他实际上是在完成美国革命未竟的一项事业。

具有反讽意味的是,为殖民地黑人奴隶的解放做出最初推动的恰是那些反对和镇压美国革命的英国人。相比较而言,与北美的殖民者不同,英国与北美奴隶制并没有多少直接的利益关联。真正使英国人介入北美奴隶制的是当时军事冲突的需要。1775年11月,英国弗吉尼亚总督邓莫尔(Lord Dunmore)率先提出参与英军的黑人奴隶可以获得自由身份。这一举动不仅使许多黑人奴隶逃离了奴隶主的控制而投入英国阵营,而且也给北美的白人殖民者,特别是南方奴隶主造成极大冲击。大批黑人奴隶直接参与英军阵营的行动,迫使华盛顿的大陆军也改变了政策,允许黑人参加大陆军。这就是为什么柏林认为,美国革命战争“几乎在每一方面都为黑人赢得自由增加了机会和可能性”。试想如果当时英方没有出台这样的政策,美国的独立战争可能就完全是一场白人之间的战争。英国的这一政策还使得原来一些对革命犹豫不决的白人殖民者投入到了爱国者的阵营。当然,英国国会对此深感不妙,很快就终止了这一政策的实施。

除了战争因素之外,美国革命时期宗教对奴隶制的冲击也值得关注。从历史的连续性上看,革命前的18世纪中叶发生的宗教觉醒运动所产生的基督教平等主义,补充和强化了革命中的平等观念。各类新教教会如卫理公会和浸礼会在南方的兴起,使相当数量的黑人皈依这些宣扬平等的教会。“在神的面前人人平等”变成了新教反对奴隶制相当富有革命性的口号。一些教会甚至成了反对奴隶制运动重要的领导势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北美的奴隶制最初是在教会里被瓦解的。

革命期间北美社会和经济结构的一些变化也给奴隶制带来了冲击,其中,农业生产结构性的变化、商业市场模式的转型、城镇化的扩大等导致了对奴隶人数需求的减少,加上黑人社会内部结构性的变化,这些都引起了白人对待黑人和奴隶制态度的转变。当时出现的一些释放奴隶和禁止诱拐奴隶的法规法令都与白人态度的转变有关。柏林文章中另一个有价值的部分是他在考察外部社会变化(如战争、宗教和经济因素)给黑人命运带来冲击的同时,还能从黑人本身的生存状态和黑人内部的社会结构来分析革命对黑人的冲击。这种内外相结合的方法为读者了解黑人在美国革命中的命运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美国革命凸显了南方奴隶制在道德上的荒谬性。这个问题其实反映了美国革命在黑人奴隶制上所面临的多重困境。这些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在一个有奴隶制存在的社会里,白人在为反抗英国统治而提出自由和平等口号的同时,也会唤起黑人奴隶们的自由意识;(2)在联合南方白人奴隶主形成抗英联合阵营的时候,又不得不对奴隶制采取一种妥协。这种妥协显然又与革命的原则相违背;(3)这种既宣扬平等自由、又护守丑陋奴隶制的行为,不可避免地给美国革命的道德原则以及革命形象造成尴尬,甚至负面的情境。同时也必须看到,北美奴隶制其实不单是北美殖民地的内部问题,它也是18世纪的特殊国际问题。英国朝野对奴隶制的态度也影响了白人爱国者和南方奴隶主对奴隶制的态度,甚至还坚定了他们参与革命的决心。

要认识美国革命的整体性,还有必要关注效忠派这一特殊的群体。在革命的早期抗税阶段,曾有相当数量的效忠派是站在爱国者一边反抗英国各项税收政策的。当战争爆发后,又有近二万名效忠派拿起武器站到了英军一方。这说明革命中的效忠派是一个难以简单界定的复杂群体。罗伯特·卡尔霍恩(Robert McCluer Calhoun)的《内战、革命和党派之争视角下的效忠派》是一篇很有观察力度的文章。他以效忠派参与战争的方式和程度来甄别他们的各类动机和行为,进而评价这场革命对他们命运的影响。他将革命中的冲突分为三个层

次,即内战、革命战争和党派之争,并分别考察了效忠派在这三种不同冲突中的状态与作用。与以往一些讨论效忠派的做法不同,卡尔霍恩特别关注效忠派在不同地区的差异性和效忠派内部社会构成的不同。他的分析使人们对效忠派这一特殊的社会与政治群体的认知进入新的层次。

由于北美大地上生存着印第安土著人,美国革命还成为世界近代史上较为罕见的一场复杂的、多维度的种族冲突。革命前,北美的印第安人已经同来自欧洲各国的殖民者打了一个半世纪的交道。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大多处于弱势和危势。革命带给印第安人的是一个毁灭性效应。他们在革命中的遭遇是对美国革命的反讽。格里高利·唐德(Gregory Evans Dowd)在他的文章《注定失败的印第安人》中,从五个具体的层面讨论了美国革命对印第安人的冲击:(1)从与科肖克顿部落的和解看革命者在争取印第安人支持上的努力;(2)英国人和爱国者如何各自利用物质补给这一关键性筹码来争取印第安人部落的支持;(3)革命期间殖民者并未停止对印第安人土地的侵占,导致一些印第安人放弃了中立的立场;(4)战争如何导致了印第安人群体内部的两极分化;(5)革命并未消除白人对印第安人的敌意和对他们土地的掠夺,印第安人也没有放弃他们的抵抗。可见,革命并没有终结长达一个多世纪的血腥冲突。了解美国革命中印第安人命运的转变,人们还需要在一个更为开阔的背景下讨论美国革命对北美印第安人命运的冲击,以及印第安人命运的改变及其文明的式微是如何改变北美人文形态的。革命前,北美殖民地至少有三种文明,印第安人的土著文明、殖民者带来的欧洲文明和黑人奴隶带来的非洲文明。美国革命无疑加速了印第安文明的消亡过程。北美的人文形态被永久性地改变了,这是美国革命给人类文明史所造成的遗憾。

最能反映美国革命与世界近代史上其他几场革命的不同之处的,就是宗教在革命中的作用。近年来,愈来愈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宗教对于美国革命的重要性。从社会文化的视角观之,美国革命爆发时,北美殖民地处于一个宗教文化流行的时期。宗教为美国革命时期的民众提供了一种特殊的文化、社会和政治的凝聚力。要了解宗教对美国革命的作用,首先要了解1720到1740年代,即革命前发生在北美的那场宗教大觉醒运动。大觉醒运动中所产生的一些变化,如强有力的福音传播、反正统教会权威的倾向、蔑视传统教区的势力范围、改革和摒弃教会的一些繁文缛节,以及跨越不同殖民地地理疆界的新教组织的建立和发展等,为后来革命的发生奠定了基础,并创造了机遇。威廉·麦克洛克林(William Gerald McLoughlin)甚至认为,大觉醒运动是美国革命的起点。这是一

个很有历史眼光的判断。在他的文章《宗教在美国革命中的作用》中,麦克洛克林指出,革命前期的许多变化首先是在宗教内部策动的,例如废除国教、抵制设置主教、教会的多元化和提倡信仰自由。正是宗教内部的这些变化使英国国王和主教的权力逐渐被转移到民众的手中。宗教变革与革命中的一些政治变化结合在了一起。“革命使不同教派剥去了它们非政治性的虔诚主义的外壳,走入了政治权力的新领域。”值得注意的另一点是,北美殖民地的宗教在革命前就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格局,革命则加剧了多元分立的过程。这其实也是宗教自由能够被写进许多州的宪法和联邦权利法案的深层原因之一。美国革命最终能够实现政教分离,这是18世纪社会政治革命最为重要的一项业绩。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美国革命前,在北美社会上流行着“千禧年即将现世”的说法。尽管美国革命作为一场社会革命在本质上是一个世俗事件,但这一基于基督教教义而源发的千禧年之说,不论对于当时北美基督教的发展,还是革命事业的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革命的动员和对革命目标的塑造中,“千禧年即将现世”的说法甚至变成了当时革命民众反抗英国统治的一种心理要素和道德基础。乔恩·巴特勒(Jon Butler)的文章《存在一个革命的千禧年吗?》将引导读者从宗教内部来观察“千禧年现世说”与美国革命复杂而微妙的关系。他特别关注当时流行的千禧年主义所具有的政治含义和促进革命转变的动力。巴特勒认为,不能简单地将美国革命视为一个完全世俗性的历史事件。上至《独立宣言》,下到一般教会里牧师们的布道,基督教影响的痕迹处处可见。同时还要注意神职人员的布道对当时政治辩论的影响,特别是牧师们的布道语言与革命修辞之间的关联。此外,关注宗教对美国革命影响的同时,还要看到革命给宗教带来的困境和教会在革命中的分化与重组。

研究美国政治思想史的学者所追寻的问题一般不会是创建美国,而是何种思想意识,以什么形式,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革命的起源、走向与结果。美国革命意识形态是在特定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下产生的特殊混合体系。同世界近代史上的其他几场革命不同,美国革命不是在一个单一的,或某种权威性意识形态的指导下完成的,也始终没有统一的思想格局,而是在多元甚至矛盾的意识形态的糅合发酵下促成的。美国革命的一些重要历史特征就体现在革命意识形态的多样复杂性之中。这种意识形态成分的多元性既反映了美国革命的复杂性,又说明这场革命是近代世界史上智识程度较高的一场革命。

美国革命不仅是一场各利益集团(包括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所展开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斗争,还是一场意识形态的竞争与冲突。伯纳德·贝林(Bernard

Bailyn) 甚至认为,美国革命“是一场在思想意识、宪政以及政治领域所展开的斗争”。比较革命的研究显示,近代世界史上的任何一场革命都不是一种自我封闭的行为,革命往往不能自行孕育和产生一个全然内部的思想意识。与外部世界(特别是欧洲)有着多元联系的北美殖民地所发生的美国革命,更是如此。美国革命的政治内涵要比人们想象的丰富得多、复杂得多。美国革命的思想文化史,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欧洲思想文化史的一部分。发动和领导美国革命的那一代人中,有相当一批人知识丰富,心胸开阔,视域宽广,有些人甚至就是欧洲大学培养出来的,他们有着跨地域和跨文化的学习与生活经历。这是美国革命的那一代人之所以能够在政治思想领域做出原创性革新的深层原因之一。也正是这些人,将当时原本处于世界边缘地带的北美变成了 18 世纪后半叶思想文化的活跃之地。这就是为什么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曾在英国国会呼吁不要低估北美造反的那些人的智识能力的原因。

伯纳德·贝林 1967 年发表的《美国革命的思想意识渊源》是一部开创性的经典。为了分析美国革命思想意识的多元复杂性及其对革命本身的影响,贝林提出了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即,是什么因素将那些看似全然不同的思想汇集在一起?又是什么因素促使殖民地人士把所接触和掌握的多种知识塑造成一个相对连贯的整体?这里所选的《美国革命中激进主义的转变》是该书几个节选的汇编。希望读者能够了解贝林所讨论的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在革命的过程中,革命的领袖们所读、所说、所写、所想和所做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他们思想观念的渊源可以追寻到何处;繁杂的思想观念是如何被连贯起来的;以及一些外来的思想观念是如何被用来解释革命所遇到的困境和针对性的解决方案的。他所采取的方法是后来新史学所提出的文本与语境相结合的方法,即在分析解读文本的基础上,再分析文本产生的历史与社会语境。他认为,对那个时代而言,美国革命中所出现的思想意识是当时极端激进的各种思想观念与信仰的结合。思想观念、信仰和态度的转变确切并及时地影响了革命的过程和走向。综合近年来一些学者关于美国革命思想意识的论述,人们可以大概窥见美国革命思想意识谱系的一些重要成分,其中包括英国自由主义的传统、清教主义传统、司法权利观念、共和主义理论、英国政治上的反政府和权威的理论、启蒙思想和 18 世纪苏格兰学派等。对其中每一项的研究都会丰富对美国革命思想意识的认知。

如果将 18 世纪发生在欧洲的启蒙运动与美国革命联系起来做历史性的考察,人们不难看出,在很大程度上,美国革命是启蒙运动真正的政治与社会成